

陳

竊國大盜袁世凱

七

竊國大逆袁世凱

竊大盜世亂

著 陳伯達

新華書店發行

竊大盜衰世

著者 陳伯達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上海河南路一七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河南北路五九號

1949年7月 1-15,000(滬)

毛澤東同志的『論聯合政府』說到近代中國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革命的民主派——孫中山先生，一個是竊國大盜的專制派——袁世凱。

袁世凱——他已死得將近三十年。但是，作爲一個政治的人，這個人直到現在仍然是我們所時常接觸到的。他是死了，但是，他的思想的、政治的靈魂，却被他的後輩復活了。作爲一種政治的象徵來說，袁世凱在現實的政治中，仍然高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而由於發展的結果，現實的袁世凱，在手段的殘酷與陰毒上，終究遠遠地超過了已死的袁世凱。

袁世凱——這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結晶，一個集中的黑暗影。他並不是一個普通舊式的政治人物。袁世凱——這個政治人物是出現在近代中國維新與守舊、革命與反革命互相鬥爭的時代，在這種不平常的時代，反動派爲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來絞殺中國的前途，就鍛鍊出了一個這種不平常的人物。

袁世凱起初是由屠殺太平天國的劊子手——李鴻章和滿清朝廷的實力派——榮祿所特別賞識的。李鴻章臨死時候，又向慈禧太后保薦他作爲自己的接替人，說是：『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一切反動派把他看成舊中國的支柱，想經過他來抵擋中

國人民對於舊中國的衝擊。爲什麼袁世凱這樣特別被一切反動派所垂青呢？因爲他在反對中國進步的事業和中國人民的事業上有特別的機智，特別的手腕，而在他的手裏還有一支反對中國人民的特別武裝力量。

袁世凱曾經做過維新派，參加過當時康有爲等人所組織的君主立憲的維新團體——強學會。康有爲等人當時代表一部份『開明』地主和一部份與大工業有若干聯系、而在政治上帶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的大資產階級，其所進行的經過皇帝和少數貴族的自上而下的維新運動，在當時雖然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這運動是脫離民衆、而且根本反對民衆參加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這種運動是不能在實際上解決任何歷史問題的運動，不但爲戊戌政變自身所證明，而且爲全部中國近代史所證明，關於這些，我不準備在這裏多說，我這裏要說的是關於袁世凱在這個運動中所扮演的腳色。在戊戌維新運動之前，袁世凱雖則經過李鴻章與榮祿的賞識，得在小站練兵，但是，他在滿清朝廷的地位並不高。到了戊戌運動的時候，袁世凱因爲參加過強學會的機緣，經過維新派譚嗣同的保舉，就從光緒皇帝那裏（八月初一日被召見）取得了特賞侍郎專辦練兵事務的職務，就是說，袁世凱以維新派的關係，提升了自己在滿清朝廷中的地位。但是，重要的，還不是因此取得侍郎的地位；就袁世凱本人來說，這地位固然是升了一步，但在朝廷中來說，這地位並不是很高的。對於袁世凱，對於當時整個反維新派，重要的，就是袁世凱以維新派的關係，參加了當時關於維新派命運的計劃，這計劃：要當那集中滿清朝廷黑

暗統治的最後權威者——西太后準備於九月天津閱兵利用榮祿軍隊威脅廢立光緒帝的時候，袁世凱的軍隊起而保護光緒帝，並誅殺榮祿。袁世凱在維新派這個計劃裏面，答應充當維新派的主角，但在實際上，他在維新派這個計劃裏面，在他談好這個計劃之後，却馬上充當了反維新派的主角。他把全部計劃獻給反維新派，因而使反維新派得以把維新派納在血海裏面。當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和袁世凱進行這種與虎謀皮的計劃的時候，譚嗣同曾告訴袁世凱：如果袁世凱不願意幹的話，就請袁世凱到頤和園向西太后告密，把他舉發殺掉，可以得富貴。袁世凱正色厲聲說道：『你把我袁某當成怎樣的人呀？』但是，一日之間，正是袁世凱，不是別人，就向西太后和榮祿獻功，告發譚嗣同及其同伴的密謀，結果，百日維新運動（從四月到八月初）就像曇花一現。站在光緒皇帝背後虎視眈眈的西太后於八月初六日重新臨朝親政，把譚嗣同等人殺掉了，又把袁世凱當時所稱為『曠代之聖主』的光緒皇帝關閉起來了。譚嗣同的話果然不錯，袁世凱就從此大富大貴了。插足維新派，轉過頭來，出賣維新派，這就是袁世凱第一次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顯現的身手。這種兩面派的『機智』，兩面派的『手腕』，就是袁世凱特別的機智和特別的手腕之重要的組成，或者更正當地說，是其主要組成。這種兩面派的作爲，使袁世凱在當時最黑暗的勢力中得到最大的愛寵。

戊戌政變之後，袁世凱的第二個拿手好戲，便是鎮壓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自發運動——義和團運動，而又對外按兵不動，觀望八國聯軍的侵略北京。這樣，袁世凱在

受中國內部反動派贊賞之後，又再加上受外國人的贊賞了。隨後他就得繼續李鴻章，担任了當時舉足輕重的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職任。

袁世凱的所以得在政治上進行大投機，大買賣，並經過這種投機的買賣，左宜右有，與妖作孽，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消說，是因為他有一種資本，這就是他在小站練兵時所弄起來的所謂『新建陸軍』。這是袁世凱可居的奇貨。在戊戌政變的時候，維新派的譚嗣同等所以特別要去結納他，就是因為他們是浮在天上，他們想依靠袁世凱帶領的軍隊去站住腳。不是依靠羣衆，而是依靠宮廷的陰謀，不是公開向人民羣衆求救，而是祕密向軍閥求救，這是戊戌維新運動失敗的悲劇。袁世凱的得志正是利用了戊戌維新派這個弱點，把維新派引上釣鉤，而後來烹吃他們。在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外國人所以特別贊賞袁世凱，也就是因為他有一支帶有新式武器的軍隊，可以幫助外國人來血洗當時那種僅有原始武器或手無寸鐵的起義的羣衆。

小站練兵——這就是袁世凱給自己的政治買賣事業建立了力量的基礎。他從這裏開始組織了作為竊國之用的北洋軍隊，培養了和團結了一大批竊國的爪牙（武的如馮國璋、段祺瑞、王占元、曹錕、段芝貴等；文的如徐世昌等），並造成了一種竊國的觀念——即所謂『北洋正統』。

以『新建陸軍』的力量爲體，以兩面派的手段爲用，袁世凱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得到中國的和外國的反動派的扶持，變成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竊國大盜。

辛亥革命，這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這革命是人民歷來反對滿清朝廷所鬱積而大爆發的結果，革命的發展是很迅速的。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革命的活動地盤主要的是舊形式的民衆組織（會黨）和新軍，而這種會黨和新軍主要的是以農民大衆構成的。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的孫中山民主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原則），是這個革命的政治綱領，起了很積極的作用。可是革命有它的弱點。工人們英勇地參加鬥爭，但那時中國無產階級還弱小，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起義民衆的自覺性和組織性顯然是很不夠的。而且起義內部又是各種矛盾的結合。各階級是在反滿的目標上結合起來，除此以外，目標是絕不一致的。反滿的革命同盟會本身就是這樣矛盾的組織，辛亥革命本身更是這樣矛盾的革命。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太過軟弱，和民衆的結合太不足，並且不但不敢使人民勝利，乃至隨時可能把革命交給反革命，而小資產階級在反革命面前也不能形成堅決的獨立力量。原來一部份和大工業有關的大資產階級和一部份『開明』的地主的君主立憲派因為請願立憲沒有結果，對清廷絕望，挺而走險，競相附和於革命，在革命內部努力取得權力。各省區代表大地主大買辦的原來統治勢力——許多舊軍閥舊官僚知道滿

清朝的命運不能久長（那時很多大官僚已預知滿清朝廷『皇靈之永不』），則紛紛掛起『革命』的旗幟，藉以企求避免真正的革命。清朝協統黎元洪從樓梯下暗藏處被起義的人拉出來，擁戴爲革命軍的第一個都督，象徵了這個革命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種革命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便被當時大地主大買辦反動派最有力量的首領——袁世凱看穿了。袁世凱憑藉北洋軍隊的關係，乘滿清朝廷搖搖欲倒的機會，以保持滿清朝廷皇帝的姿態，很順利地把滿清朝廷玩弄於自己的手掌中，取得了滿清朝廷統治下的全部權力，同時又利用了北洋軍隊的力量給那武漢幼弱的革命軍一個嚴重的打擊，遂又停止軍隊行動，這樣一打一拉，一張一弛，以作爲軟化革命的張本。袁世凱的箭，一方面要射倒滿清朝廷，一方面要射倒革命。他對滿清朝廷這末說：『你如果不給我全部權力，那末，我就不能夠保護你。他又對革命方面這末說：『你如果不給我全部權力，那末，我就能夠殺你。他命令北洋的軍隊打擊革命軍，這是同時告訴北方的滿清朝廷和南方的起義當局：他手裏是有力量的，兩方面都應該向他妥協，由他來『建設一堅固之政府』，由他來『統一中國』。當他的部下在漢陽打擊革命軍之後，他就任滿清朝廷內閣大臣的時候，就這末宣佈其政見：

『……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故爲中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政府。……余願進步黨人……與余通力合作……』

余之志願既如是宏大，必有誤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擊，……顧余不因稍受波折，遂更變余最高應盡之職，蓋余之作爲，爲保護中國免於分裂計也。」

名義是很好聽的，什麼『保存中國』呀，『免中國之分裂』呀！但是怎樣能夠達到呢？就是要愛國者犧牲其愛國的政策。據他說，扶助了他，那末，中國也就可以『保存』了，中國也就可以『免於分裂』了，因爲他的『目的』——當然這只有天知道——就是『保存中國』，就是『保護中國免於分裂』。袁世凱在這裏也宣佈了他分化的政策：即利用起義內部革命派與立憲派的矛盾，爭取立憲派——袁世凱所謂進步黨人——去和他通力合作，以孤立並軟化革命派。

『我即中國』——這就是袁世凱最高的觀念。袁世凱表示不管四方對他如何攻擊，事業有何波折，他決不改變這個觀念，他決在行動上貫徹這個觀念。這是他所謂『最高應盡之職』。

袁世凱這種觀念，是反映了當時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觀念。滿清朝廷，這個統治機構，統治形式，是太朽腐了。這朝廷是代表大地主大買辦的集中統治，但是，在人民的衝擊下，這朝廷是再統治不下去了。大地主大買辦需要變更自己的統治形式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帝國主義者需要經過新的統治工具來奴役中國的人民，他們要一手打倒革命，又要一手推開滿清朝廷，重新建立大地主大買辦的新的集中統治，於是他們就在當時的

反革命人物中，根據袁世凱手裏的軍隊及其反革命的威望和手腕，找出了袁世凱，付給了他這末一種『最高應盡之職』。當時中國『上流社會』中所流傳的口頭禪是所謂『非袁莫屬』，在華外國人中所流傳的口頭禪是所謂『非袁不能收拾』，祕密就是這個。袁世凱就是這末得到他們的付托，宣佈了自己就是中國的代表——他即是中國，中國即是

他。

當時上海英文『大陸報』的北京電報正確地報導了袁世凱的計劃：『袁氏之意，實欲使北京政府（按：指當時滿清政府）、民國政府（指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並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獨攬大權。』

顯然的，袁世凱的活動，已引起了當時起義內部的紛亂。袁世凱武力的威脅，這是一；袁世凱狡猾的兩面派活動，這是二。在袁世凱武力威脅和兩面派活動下，起義內部的矛盾展開了。只要倒滿的目標達到，他們的上層人物差不多都可以和袁世凱成立妥協，把革命宣告結束。那種掛『革命』旗幟的舊官僚舊軍閥，不用說願意奉袁世凱做自己的新主子。臨時附和起義的君主立憲派，希望經過袁世凱穩定自己的祿位。資產階級的反滿革命人物很多也但願保留『共和』的形式，不願意再革命下去，他們只要袁世凱採取『共和』的形式，就同意他做起大總統。滿清朝廷不能再統治下去，起義內部不能再革命下去，袁世凱坐江山的局面就此決定。

北洋軍隊是袁世凱使革命和滿清朝廷都向他屈服的基本力量。當革命同盟會的領袖

孫中山在南京做臨時總統、組織起資產階級式的臨時民主政府（反滿革命派和君主立憲派的臨時聯合政府）的時候，袁世凱就使用了他的將校段祺瑞等人發出『誓死反對共和』的電報；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南方在談判中向他屈服，孫中山內定讓位，袁世凱又使用了段祺瑞等人發出『立採共和政體』的電報。革命把滿清朝廷的整個統治打得四分五裂，袁世凱手裏的武力無論如何已不能把滿清朝廷的統治重新恢復起來，但是，革命內部的上層人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領導者，却極害怕袁世凱手裏武力的威脅。他們既然不能充分信任羣衆的力量，就不能夠團結起來，並不能深入動員羣衆，去抵抗袁世凱手裏武力的威脅。至於滿清朝廷那時已經只剩下了空架子，若干王孫公子雖然不願意袁世凱的篡奪，但是，畢竟毫無力量可以抵抗袁世凱手裏的武力。這樣，孫中山內定退位，溥儀也跟着決定退位。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溥儀宣告退位，命令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第二天（十三日）孫中山也便公開提出辭表，『推讓』袁世凱爲繼任總統。『民國政府』和滿清朝廷在同一時候都把權力交給了袁世凱，辛亥革命與愛新覺羅氏皇朝在同一時候宣告自己的結束。這叫做『全國統一』。

辛亥革命並沒有觸動過舊封建專制統治的、年代久遠的、壓在人民頭上的軍閥官僚政治機構，這種機構幾乎原封不動，僅換些名稱而已，這樣就便利於把權力從革命交給反革命。辛亥革命更沒有觸動過近代中國反革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礎——即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制度。雖然孫中山有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革命口號，但資產階級

並不希望、也沒有力量把它變成實際。這樣就更便利於反革命的統治在這個原來的經濟基礎上重建起來。

人民經過革命推翻了滿清朝廷，但革命的果實却沒有落在人民的手裏，而被大地主大買辦反動派代表人物袁世凱所篡竊而去。事業按照大地主大買辦和帝國主義的願望進行，軍閥官僚又都彈冠相慶了。

『民國政府』一些人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本來想叫袁世凱離開北洋軍閥官僚的老巢穴，到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以便約束袁世凱對民國的地位，但是既然是『民國政府』經過資產階級政治代表之手納權給袁世凱（就是說，『民國政府』向袁世凱投降），而不是袁世凱納權給『民國政府』（就是說，不是袁世凱向『民國政府』投降），那末，袁世凱就職的問題，就只得按照袁世凱的意志，而不可能按照『民國政府』的意志。按照袁世凱所說：他本來是先受滿清朝廷委任『全權組織共和政府』的，如果你以為這樣說不妥，但還有『北方各省軍隊暨全蒙代表皆以函電推舉為臨時大總統』，縱使你南京參議院不推舉我，我還不是仍然可以在北京做我的大總統？按照袁世凱所說，他所以接受南京的推舉，不過是因為照顧南北的統一。並且，『北方軍民意見』是不要他離開的，北京外交團又是『向以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的，『若因凱一去，一切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志』。你孫中山和南京參議院一定要他離開這末一個地方，豈不就是『危害民國，破壞統一』？但是『民國政府』還是遣使迎袁南下，

於是袁世凱的親信軍隊（就是後來以『賄選總統』著名的曹錕直接部隊）又顯現神威了。北京、天津、保定出現了受命的『兵變』，迎袁專使的寓所遇劫，所謂專使也者，僅以身免。這當然是證明了袁世凱需要坐鎮北京而不能南下的理由。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職。迎袁的專使蔡元培曾經這樣大談其『民國的法理』：

『袁公當蒞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爲法理上不可破之條件，蓋以立法行政之機關與被選大總統之個人較，機關爲主體，個人爲客體。故以個人就機關則可，而以機關就個人則大不可。且當專制共和過渡時代，當事者苟違法理，有以個人凌躡機關之行動，則爲專制時代朕即國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故袁公之就職於南京，準之理論，按之時宜，實爲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

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機關就個人』了。『個人凌躡機關』了。神聖也可以侵犯。了。袁氏在北京就職，居然也還是被專使們認爲『尊重法理』，也沒有『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袁世凱早已看穿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空談無用。袁世凱左右了法理，而並不是法理左右了袁世凱。袁氏『朕即國家』已不是『嫌疑』的問題，而是從袁世凱就任大總統的時候便已開始了。

當南北談判還沒有結果，『民國政府』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還沒有決定交出權力的時候，袁世凱給梁鼎芬的信說是：『惟有益堅盡瘁之初心，勉竭鄙力所能至，舊此愚

忠，戰彼羣魔，但求皇統之能保存……。』又時常對人說：『余深荷國恩（按：指滿恩），雖時勢至此，豈忍負孤兒（指溥儀）寡婦（指隆裕太后）乎？』這正如『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所描繪的：『其容貌，其言語，其態度，粹然一愛新覺羅之大忠臣。』但是，一等到『民國政府』向他屈服的時候，他就對臨時政府這末說了：『共和爲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這些當然又是：其容貌，其言語，其態度，粹然中華民國之大忠僕。『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斷言是對的：『大奸大竊，其貌每大忠大信。』在袁世凱的字典中，大忠大信的註解，便是大奸大竊。當他在宣誓忠於滿清舊皇室的時候，正是在進行轉移清祚到他自己手裏的時候。當他在宣誓忠於共和的時候，又正是在準備完全毀滅共和的時候。

中國出現新的皇朝，這就是袁世凱的皇朝。但這皇朝開始是採取了『民國』的形式。對於袁世凱，這是建立正式的、公開的袁氏皇朝的過渡形式。

三

辛亥革命的時候，社會各階級在反滿的目標下來一個向左走，革命的發展也就來得很迅速；在反滿的目標告一段落之後，參加起義的各黨派即來一個向右走，革命的失敗

也就又來得很迅速。

資產階級的反滿革命派和袁世凱妥協之後，放棄了革命，變成了在野黨；原來一部份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派則變成了政府黨。

原來的革命同盟會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已開始分化。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同盟會和一些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譚延闓等）及一些舊官僚（如唐紹儀等）結合起來，組成國民黨（民國元年八月成立），是為在野黨；而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張謇、湯化龍等）及一些舊官僚武人（如程德全、黎元洪等）則又和同盟會的另一部份人（如章炳麟、張伯烈等）結合起來，組成共和黨（民國元年五月成立），是為政府黨。這是北京臨時參議院中並立的兩大黨。『不久，章炳麟從共和黨分裂出來，維持他原來成立的『統一黨』，而參加共和黨的一些君主立憲派（如湯化龍、林長民）和另一部份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孫洪伊）又以梁啟超為首領，另行成立所謂『民主黨』，打算操縱於參議院上述兩大黨之間。』

作為這兩個政黨的政治分別，是在何呢？國民黨的政綱是：『（一）促成政治統一；（二）發展地方自治；（三）實行種族同化；（四）注重民生政策；（五）維持國際和平。』共和黨的政綱則是：『（一）保持全國統一，採取國家主義；（二）以國家權力、扶持人民進步；（三）應世界之大勢，以和平實利救國。』國民黨的政綱除了『發展地方自治』是比較共和黨表現得民主主義和急進外，其他兩黨的政綱基本上已